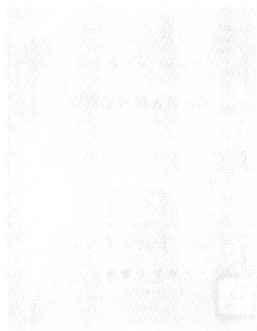


I106.2
19
2006



梁宗岱 著
刘志侠 校注

诗与真续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与真续编/梁宗岱著;刘志侠校注.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12

(梁宗岱著译精华;插图本)

ISBN 7-80109-815-3

I. 诗... II. ①梁...②刘... III. 诗歌—文学研究—世界—文集

IV. I1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2721 号

诗与真续编

梁宗岱著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010)66509360 66509352(编辑部)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http://www.cctpbook.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新丰印刷厂

开 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 数:243 千字

印 张:10.875

版 次:2006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6.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首席顾问律师鲁哈达

出版说明

一、梁宗岱是著名的诗人、教授，创作广及诗词、中外文学翻译和文艺评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有深刻的印记。由于历史原因，他的作品长期尘封，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零散重印。本系列全面汇集梁氏的主要作品，以满足文学爱好者的不同需要，并为学者专家提供一个可靠的版本。

二、本系列包括《梁宗岱选集》和五种单行本。单行本除《诗与真续编》外，全部采用旧本的书名，但通过合集或新增，大幅增加内容：

1.《梁宗岱选集》：综合文集，分为诗词、评论、译诗及译文四部分。

2.《诗与真》：文艺评论集，旧本《诗与真》与《诗与真二集》合集。

3.《诗与真续编》：文艺评论集，汇集作者生前未及结集的评论，附录诗词集《晚祷》和《芦笛风》。

4.《一切的峰顶》：译诗集，收入旧本《一切的峰顶》、《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浮士德》（节选）和法译《陶潜诗选》。

5.《蒙田试笔》：译文集，除《蒙田试笔》外，新增附录《蒙田书房格言》。

6.《罗丹论》:译文集,包括《罗丹论》和里尔克小说《听石头的人》,新增罗丹作品图录。

三、内文根据作者生前修订的版本重新校勘重排,集外作品悉照初刊,个别引文及译文曾参考中外文原著订正。

四、每集新增校注者引言,简要评述相关作品及介绍创作背景。

五、全新编写注解,补上外文专名及通行译名。分行和标点略有变通。异体字曾作规范处理,在不影响理解的原则下,保留个别词语以呈作者的写作风格及时代面貌。

诗与真之路

刘志侠

梁宗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文学批评家。由于时局关系,也由于个人选择,曾长时间置身文坛之外,已出版的评论集《诗与真》(1935年,商务印书馆)和《诗与真二集》(1936年,商务印书馆)也被打入冷宫。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重见天日,海峡两岸出版社相继重刊,广为流传,已成为经典作品。

梁宗岱很早就尝试文艺评论,现存的最早文献是《左氏浮夸辨》,写于1917年左右,当时他刚考上中学,年仅十四岁,文章以文言写作,投给校报刊登。至于“真正”的评论,第一篇发表于1923年8月上海《文学周刊》八十五期上,题名《杂感》,针对成仿吾和郭沫若的文章与译诗表示不同意见。如果只观文字不问其人,很难相信这篇初试啼声的作品出自一位二十岁的年轻人笔下。差不多一年后,当事人成仿吾在给《文学周刊》主编郑振铎的信中还旧事重提:“去年有一个梁宗岱君曾在贵刊上为两句英文把我痛骂过……我为中国的评论界痛哭过一次。”(1924年6月《文学周刊》一二五期)可见该文力度之大,作者的雄辩和锐利笔锋,预告这将是一位出色的评论家。

梁宗岱的最末一篇评论发表于1962年,应报刊邀约写成《怎样理解于连这个人?》。梁氏下半生(1949年后)仅得三篇评论短文,均完成于这一年,这是因为当时正值学术气氛较为宽松的年

代。

在这两个时期之间,梁宗岱经历了两个创作高峰。第一阶段从1927年至1936年,他到欧洲游学,接触到西方文学界,受到强烈的冲击,开始从事翻译和介绍西方作家,所得评论收入《诗与真》与《诗与真二集》。

第二阶段从1937年至1943年,由于抗日战争爆发,梁宗岱撤退至后方,在重庆复旦大学任教,尽管兵荒马乱,他没有停止创作,完成了三篇长论文,探讨的范围离开他熟悉的外国文学和理论。由于战乱,这些作品流传不广,却是梁宗岱诗与真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

第一篇《屈原》是为1941年第一届诗人节而作。当时正值民族生死存亡关头,屈原的正气和悲壮的结局,正好用来激励爱国主义,在大后方的作家和艺术家都积极参加纪念活动,几乎所有报刊都开辟专栏,刊登纪念文章和诗词,但喊口号的多,真正探讨学术的论文却很少,梁宗岱的《屈原》和李长之的《孔子与屈原》几乎是仅有的两篇。

《屈原》是一篇独具个性的文章,作者开宗明义宣布自己的评论方法:“……我们和伟大的艺术品接触是用不着媒介的。真正的理解和欣赏只有直接叩作品之门,以期直达它底堂奥”,“一个敏锐的读者不独可以从那里面认识作者底人格,态度,和信仰,并且可以重织他底灵魂活动底过程和背景……”。具体的做法是按照时序,逐篇评介屈原的作品。他的诗人语言像一团烈火那样,从第一页一直烧到最后一页,一气呵成。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以抒情文字来写诗评可说绝无仅有,而他的见解有不少独到之处。评论家李长之自己写了长文纪念屈原,但在读完梁作后,也禁不住击

节叹赏：

作者对于风格，更特别有一类敏锐的美感，他以轻歌微吟来形容《九歌》，他以促管繁弦来形容《九章》，他以黄钟大品来形容《离骚》，他并以“刻画精致，雕骨镂肝的雕刻或工笔画”来形容《招魂》（页90），这形容有多美，有多切！

在他抒写他那审美底印象中，尤以关于《橘颂》的一段最成功。他说：

当我们从这些作品，尤其是，譬如说，从《涉江》或《悲回风》转到《橘颂》的时候，我们仿佛在一个惊涛骇浪的黑水洋航驶后忽然扬帆于风日流利的碧海；或者从一个暗无天日，或只在天风掠过时偶然透出一线微光的幽林走到一个明净的水滨，那上面亭亭玉立着一株“青黄杂揉”的橘树，在头上的蓝天划出一个极清楚的轮廓：一切都那么和平，澄静，圆融……（页37）

……从来人对于《橘颂》的赞赏，可说没有这样深刻，尽致，而又不失却美的！

高头讲章式的著述过去了，诂订考证式的篇章也让人厌弃了，我们难得有这样好的批评文字。对过去任何大诗人，我们似乎都应该由具这样艺术素养的人去表彰一番。（《评梁宗岱〈屈原〉》，《苦雾集》，商务，1943）

作为评论家，李长之也不忘“评论”，他认为梁氏“不能忘情于和一般的考据家打笔墨官司”，“把许多作品强属于一个人——屈原”。不过，他承认这是“不厌求详地苛责”。事实也是这样，因为

屈原个别诗篇的真伪争论源远流长,早在汉朝便开始,一直没有定论,即使到了今天,仍然处于百家争鸣的局面。李长之的看法只是一位学者在一时一地的一种见解,事实上,与梁宗岱站在同一立场的研究者为数不少。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民族的危机促使梁宗岱去思考科学精神,写成了《非古复古与科学精神》。他在文首写道:“本文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试去认识我们民族性一个基本弱点。其中所论列,没有一点不是一个稍微关心我国学术界和浅尝科学理论的人所能见到的,作者不过想加以比较系统和透彻的分析,使自己得到一个清楚的概念而已。”

文人谈科学,谈何容易。可是梁宗岱举重若轻,在自己熟悉的东西方作家和哲学家(孔子、庄子、哥德、梵乐希等)的著作里,轻易找到所需的例子和论点。而他所批评的“我国自海通以来,我们对自己固有的文化似乎总不出这两种态度:夜郎自大和妄自菲薄”,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在文首提到的刘子华事件就是一个例子。1940年,这位勤工俭学留学生以八卦推算太阳系行星尚缺一颗的论文获得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当时引起国内报章的一片嘲笑声。踏进八十年代后,美国科学家数次宣布发现第十颗行星,每次宣布都令刘子华再次成为新闻人物,有些报刊把他捧为这颗行星的真正发现者、天文学奇才、中国“哥白尼”,另一些则认为他贩卖伪科学,“江湖术士”,“欺世盗名”。这正合了梁氏当年一段话:

自尊和自卑,复古和非古,也就是普恩迦赫所说的,拒绝思索的全信与全疑:仿佛我们对于自己的文化,和政治上的左

右倾一样,除了两极端就找不着出路似的。

稍为知道梁宗岱生平的人,都会把这篇文章和他中年后从事中药研究联系起来。在他的遗稿中,有一篇《我学制药的经过》,一开头便引述了《非古复古与科学精神》的两大段文字,其中一段高度评价中医药:

可怜我们中国……学和术始终没有联成一气,而只有模棱笼统的纸上谈兵的学,和墨守成法的莫名其妙的术。唯独医药一门,因为关系于一个更迫切的现实,理论和实习还或断或续地相辅而行。虽然限于一般学术水准,始终没有发展成科学;这几千年来所积蓄的经验,那些慢慢地在摸索中淘汰掉错误所剩下来的经验(因为,我们不能否认,旧医对病理的解释尽管不合理,治病却往往有惊人的效验)却不失为一个科学原料底无尽藏的富源,有待于我们那些受过新训练的医学专家之抉择,整理,吸收或发扬……

这段话并非来自书本或凭空想出来,梁宗岱自小因为父亲赠药济贫而对中草药产生兴趣,十二岁前曾经跟江湖草药师父入山采药,亲眼看到中医药的疗效。但真正的研究工作要到1944年才开始,这年他辞去复旦教职回广西百色居住。他的研究路向正是本文阐述的主张:“不非古,不复古,奉行科学精神”。他从传统中草药入手,提炼其中精华,通过反复临床试验,证实有效后进行批量生产。最早的两种药品叫做“草精油”和“绿素酊”,名字一中一西。1950年,他在广西竭尽个人财力成立了太和化工厂,准备动

手生产,但不旋踵时局遽变,药厂被迫关闭。但他毫不气馁,此后数十年,继续在家里独自研究和少量制造。他不仅赠药医人,也用来自疗。到了晚年不幸遇上“文革”,多次在斗争大会被殴打得遍体创伤,事后他使用“绿素酊”来自我疗伤。一个文人这样身体力行去实践科学,在当代文学史上未见第二人,同时也证明了《非古复古与科学精神》不是一篇徒有虚言的泛泛之作,而是出自作者的真正信念,一字一句都是由衷之言。

1943年,梁宗岱重新回到他擅长的文艺批评,在重庆复旦大学学报创刊号发表了《试论直觉与表现》。这篇论文一直没有出单行本,较少为人所知,却是中国文学史上一篇罕见的文献。

“直觉与表现”本是文学艺术的一个重大课题,文中所选的例子,几乎全部来自梁氏的个人作品,尤其1941~1943年写成的诗词集《芦笛风》。梁宗岱在二十世纪初新文学运动中崭露头角,以新诗集《晚祷》(1924年)成名,二十多年后,忽然采用词来创作《芦笛风》。旧体词被新文学运动视为陈腐过时的文学体裁,属于打倒的对象,表面看来,梁氏的做法否定了昨天的自我,难免引人议论。《试论直觉与表现》于此时出现,又大量引用《芦笛风》的句子,因此给人一篇“自辩词”的错觉。

事实并非如此,梁宗岱对“直觉与表现”的探索远于旧词写作之前,1935年在施蛰存主编的《文饭小品》发表的《论崇高》便已提及:

、朱光潜先生是我底畏友,可是我们底意见永远是纷歧的。五六年前在欧洲的时候,我们差不多没有一次见面不吵架。去年在北平同寓,吵架的机会更多了:为字句,为文体,为象征

主义,为“直觉即表现”……

最早的草稿大约启端于1937年春,这年3月,他在《从滥用名词说起》(《宇宙风》36期)中写道:

我这两天因为要写一篇《“直觉即表现辨”》(一半是要批判克罗齐美学底根据,一半想藉以说明我几年来对于创作心理所拟的一个假设,也许还夹入几句我对于文艺心理学的管见),把这书细心重读一遍……

在他留下的极少量的手稿中,还奇迹般地保存着这篇文稿的第一页,标题《“直觉即表现”辨》。但同年七月七日发生“卢沟桥事变”,梁氏仓促辞京,令这篇文章迟至1943年才问世。此时他已写成《芦笛风》,但对新诗的热情丝毫未减,文章一开头便骄傲地宣称:“新诗在新文学中虽然是最遭人白眼的产儿,其实比那一部门都长进。”他之所以放下新诗转向旧词,源于对诗的真善美孜孜不倦的追求:

我这二十余年如一日(我相信你不会以我为夸大)对于诗的努力,无论是二十岁前的《晚祷》之系统地摒除脚韵(那是为获得一种更隐微更富于弹性的音节),或者那对于极严格的几乎与中国文字底音乐性不相投合的意大利式商籁之试作,差不多都指向这一点:要用文字创造一种富于色彩的圆融的音乐。

他在文章讨论的主题是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 1866~1952)提出的直觉与表现的关系,具体评论的对象则是美学家朱光潜根据克罗齐理论发展而来的“直觉即表现说”。梁宗岱从自己的文学体验出发,提出自己的见解,认为直觉不等于表现,表现不等于艺术。只有个别大师在特定场合能做到直觉与表现即时合一,否则“从作品形成底步骤而言,则由直觉到表现,至少经过四个阶段:受感,酝酿,结晶,和表现或传达”,“我不相信在上艺术上有一种离开任何工具而存在的抽象的表现”,因此选择表现的工具(艺术形式)成为文艺追求必经之途。刚好梁氏的诗歌创作经历过新诗、十四行诗和旧体词几个阶段,他进行自我剖析比使用其他作家的例子更具说服力。

在这篇长文中,梁宗岱毫无保留地披露了自己的诗人心路历程,叙述如何毕生追求“诗与真”,如何从事实(真)出发,一斧一凿,把粗糙原始的石块(文字),雕琢成文学最高形式的大理石像(诗)。这种深刻的自我剖析不仅文学史上罕见,而且不是任何人都能够做到,只有像他那样兼具诗人和文艺批评家气质的人,才能写出这种文情并茂、钩隐抉微的深刻文字。

反过来,文章留下的第一手资料能够让人更好地理解他的诗歌作品,尤其《芦笛风》。这本集子在1943年出版,适逢战乱,流传不广,直到2001年才由广东人民出版社重刊。编者在序言中说,为了清除“许多人都认定:《芦笛风》是写给甘少苏的”的错误印象,以及纠正某些文章“借宗岱生平的一些事件,凭自己的想象,把词集里某几首作品硬套上去”的谬误,一方面采用梁宗岱主张的“直叩作品”的“走内线”做法,同时又“走外线”,“尽量了解一首词出现的背景”,在注释中详细解释某些句子,和梁氏的具体

生活细节联系起来。可是出版者在封面和扉页加印了两行触目的广告口号：“一个尘封半个世纪的爱情童话，解放后首次出版。”任谁看了都立即把《芦笛风》当成一部爱情日记，书内的背景注释也无可避免地受牵连，蒙上了索隐的色彩。

我们知道，梁宗岱向来不认同以索隐方法进行文学评论。《试论直觉与表现》包含不少具体的事实，但是范围不限于《芦笛风》的写作，也涉及更早的《晚祷》和十四行诗。作者只是为了交待创作源头的“直觉”从何而来，然后由此出发，去论证“受感，酝酿，结晶，和表现或传达”的文艺创作过程。他在文内提醒读者：

当我正酝酿着要和原作第十首（即和作第九首）的时候，上文所提的那位朋友忽决定那踌躇了许久的远行，——同时也决定了这首及以下三首底题材。但这并非说这几首词所写的尽是由她底辞别引起的离绪，虽然在她临行的前夕我们（还有两位别的朋友）在灯下度过一个极平静又极温暖的晚上。因为一切文艺底目的固不是纯粹外界的描写，也不是客观的情感底表现，而是无数的景象和情思交融和提炼出来的一个更高的真实。

这的确是文学的最大特点，文学来自现实，超越现实，表达全人类共有的感情和价值，具有超越性和普遍性，能够引起和作者素昧生平的读者的共鸣。从“直觉”到“表现”，其间经过不知多少变化，两者距离不知有多远，像化学反应那样，其过程是不可逆的。差不多同一时期，梁宗岱在《莎士比亚的商籁》（1943年8月《民族文学》1卷2期）一文中重提同一观点：

要想根据诗人的天才的化炼和结晶,重织作者某段生命的节目,在那里面认出一些个别的音容,一些熟悉的名字,实在是“可怜无补费精神”的事。

他当然不会想到自己的诗词遭遇类似的命运,幸好他留下这篇《试论直觉与表现》,足可绳愆纠谬。他等待的是真正的文学批评。在这方面,他十分清楚诗歌创新和探索存在的风险,但对自己的作品深具信心,他在文首说:“关于批评,我始终深信‘时间是最公允的裁判’。”为了方便读者评价他的诗词,以及和《试论直觉与表现》对照,我们特别把《晚祷》和《芦笛风》附在书末。

本集汇编梁氏生前未及结集的文艺评论和三篇抗战政论杂文。这些文章多数写于战乱时期,零散发表在不同刊物上,原件难得一见,令校勘殊为困难。幸好得到中国国家图书馆吴京生先生的热心协助,为我们从多个图书馆觅齐初刊的影印,保证了这本文集的可靠性。

集内章篇以写作时序排列。在字里行间,我们又重新见到熟悉的梁宗岱,他的博学、直爽和雄辩,他的诗一般优美的语言,几乎可以听到他的急促的呼吸声和猛烈跳动的脉搏。由于这些作品和《诗与真》、《诗与真二集》一脉相承,作者满腔热情地在文学道路上探索,所以本集题名《诗与真续编》。

二〇〇六年二月于巴黎

目 录

诗与真之路(刘志侠)	1
左氏浮夸辨	3
杂感	4
《尼采底诗》译序	10
关于《可笑的上流女人》及其它	11
再论《可笑的上流女人》及其他	17
巴士卡尔《随想录》译注	23
释《象征主义》	
——致梁实秋先生	34
从滥用名词说起	43
《从滥用名词说起》底余波	
——致李健吾先生	55
论诗之应用	62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68
谈抗战诗歌	70
谈“朗诵诗”	77
求生	82

胜利底条件	85
屈原	89
非古复古与科学精神	137
莎士比亚的商籁	176
试论直觉与表现	182
黄君璧的画	239
论《神思》	245
法国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卢梭	252
怎样理解于连这个人?	256
附录	261
晚祷	261
芦笛风	298